

## 社会分层和弱势群体的继续教育

萧 今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摘 要**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性人口流动使职业重新区分和组合,导致了社会阶层的重构。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工商业实体,由于缺乏充足的职前教育培训准备,缺乏可利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居住的社区缺乏社会服务设施,他们长期陷入不利境地,成为弱势群体。教育有两重性,既可以促进一个人向上流动,也有社会分层和阻碍向上流动的作用。继续教育作为第二次机会,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应该着重放在公共空间的建设,改善弱势群体社会活动的基础设施和环境,便于不同的教育服务机构和志愿者进入,为弱势群体提供切身需要的教育培训和服务。

**关键词** 继续教育; 社会分层; 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07)03-0063-14

### 一、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层

社会种种因素,包括社会变革、历史变迁、教育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差异和地域差距以及个人特性,使人组成不同的人群或者社团。自有大生产分工以来,职业纵向排列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人群最显著的因素。近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性的经济改革和人口流动,使职业重新区分和组合,导致了社会阶层的重构。<sup>[1]</sup>引起社会关注和争议的是,经济快速发展和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社会不公平化加剧,人群分化差距拉大,各类弱势群体不利境况改善的前景不明朗。

人在社会中向上、向下、或者向旁路流动。社会分层是按照社会所意识到的不同等(inequality)指标来区分人群,包括收入和财产、权利和社会地位、影响力、年龄和性别、种族和个人特征等等指标,这些指标往往直接或者间接与职业分工有关。<sup>[2]</sup>社会学家将社会流动分为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vertical mobility)和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vertical mobility)。代际流动指家庭上一代人与下一代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流动,例如农村的父母通过教育让子女进入城内

收稿日期: 2007-05-31

作者简介: 萧今,女,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工作;代内流动是一个人在一生的历程中在社会阶层体系里流动,例如通过农业转向工业,从工人晋升成技术员,达到往高处走的流动。

近30年里,经济开放和改革是影响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在传统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门外,衍生了大量的农村集体经济、个体私人经济、外资企业和新的股份制企业。企业经营实体自主管理,改变了政府人事劳动部门分配劳动力的传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经济实体,加上城市人口跨地区求职,形成了全国性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人口流动。<sup>[3]</sup>最近的中国农民工研究报告推算,目前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加上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sup>[4]</sup>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改变了劳动力比例结构,例如:在城市里,劳动力在国有企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70%下降到2002年的47%,在集体企业从23%降到7.4%,自雇、私营和外资企业等8种所有制雇用了其余45%的劳动力;农村劳动人口有35.1%在乡镇企业、私营工商业和个体自雇业内就业。<sup>[5]</sup>

人口大量迁移引起职业性分化。陆学艺的观察发现,个人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教育资源等等对社会分层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些向上流动快的人群拥有资源的优势,很快在职业变动和社会变迁中获得上端的职业。<sup>[6]</sup>那些拥有最少资源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改变时,如国企改革和下岗、沿海新兴制造业兴起,被抛到相对边缘的境地。从林卡和范晓光关于贫困和反贫困的文献综述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是改善中国绝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城市职工工资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绝对收入也在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贫困人口在20年里(1978~1998年)从2.6亿下到4200万。<sup>[7]</sup>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拉大使主要社会群体呈现弱势化趋向。<sup>[8]</sup>国家资源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限制了农村地区、西部地区获得同等的公共投资,农民和西部整体处于经济的绝对和相对的贫困之中,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滞后。<sup>[9]</sup>例如,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低微,难以支持子女完成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相比之下,国家发展政策长期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倾斜,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指标和职工工资都达到了西部的两倍以上<sup>[10]</sup>,居民的社会处境以及地方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得到改善。资源分配也成了有关社会政策讨论的焦点。

## 二、教育与继续教育的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都认为,教育对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学校的区位和名声、个人从教育中接受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接受教育的程度、在教育中形成的能力,都会影响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路径以及今后在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机会。<sup>[11]</sup>社会分工,具体到个人求职取向、

雇工标准和分工、工作绩效评定和工资评级、职工一生的收入期望,都与第一次正规教育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成人教育学认为,人的寿命增长,同时知识和技术更新周期缩短,社会变化加快。只依靠青年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足以应付一生中接踵而至的社会冲击和技术变化。继续学习是保持与生活、工作和社会变化同步的重要策略。<sup>[12]</sup>因此,为人口提供继续教育成为社会性的政策考虑。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家和中国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大规模为成人提供的各种教育培训与社会变革应运而生,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参与层次,都成为重要的为整个社会提供教育的体系。<sup>[13]</sup>

在经济转型期间,笔者对中国三个大城市和12个县的企业职工作了调查,有几项发现:1. 居于上端的职业群体(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最多,无论是企业提供的还是个人付费的成人教育;2. 企业内的培训对个人提高效益、工作变动和工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3. 积极参与企业改革的职工同时积极参加企业培训,也自己付费接受成人教育培训;4. 那些处于职业阶梯下端的群体(非技术工、临时工、后勤工)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5. 西部的职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总量最小。<sup>[14]</sup>在深圳的研究发现,那些处于工作阶梯下端的工人,大多只有9年或者更少的教育程度,他们能力低,或者动机弱,较少参加在职教育培训;12年的普通高中教育打下充分的教育基础,可以让一个人有能力在将来完成正规高等教育或者成人高等教育。<sup>[15]</sup>这与OECD国家的发现一致,即教育程度低的个体较少参与教育培训。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较少进行学习,会减少给个人自身带来的福利;与此相反,个人更多参加与工作相关的学习,会促进个人的社会福利增加。<sup>[16]</sup>

文化教育不足的群体,很容易被现代职业边缘化。在义务教育机会不均衡的情况下,辍学者一离开学校就失去了进入上端劳动市场的门票。随着工作中技术使用程度的提高,文化教育程度(literacy)差的人群,工作能力也较低,在新环境中解读复杂信息和功能符号的能力也很低,成为功能性弱势群体。<sup>[17]</sup>经济发展中新职业出现,高文化程度的人口可以迅速转行,进入高收入新职业;而另外一些人群会被抛出劳动大军,成为职业弱势群体。此外年龄和性别成为主要的聘选因素,例如,大量企业聘用政策有明显的歧视偏向,三分之二的男性以初中教育的文化程度就可获得技术工作,而三分之二的女性要以高中教育程度才能获得这份工作,个人教育投资和收益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职期间教育培训对提高职工的技术级别和工资是有正向影响的。<sup>[18]</sup>

简而言之,教育有着两重性,无论是职前的正规教育还是工作中的在职成人教育培训,既有促进一个人代内向上流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分层和阻碍向上流动的作用。基于上面的实证研究,无论从社会学还是经济学的观点看,在职期间的教育培训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知识、技能和态度,提供第二次向上流动的机会。<sup>[19]</sup>但处于社会和职业下端的人群,教育程度和能力都很

低,加上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与个人特性相互作用,可能在种种情况下都被排斥在教育与培训体系之外,成为永久性的弱势群体。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大规模发展的今天,哪些因素阻碍了弱势群体充分参与教育培训?如果要利用教育培训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这个群体在哪里?他们的状况如何?

### 三、弱势群体的特征

文化、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特性的原因都会阻碍弱势群体参与教育和培训。<sup>[20]</sup>我们暂且把弱势群体定义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充分的教育程度就离开了正规教育体系的群体;他们进入劳动市场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处于社会群体和劳动职业群体的低端,很少获得教育培训的机会。本节参阅一些实地调查报告,尝试描述影响弱势群体人生流动的因素和他们的处境。

#### (一) 身份和教育经历

随着沿海、东部和大城市的经济繁荣,农民工涌进城市。在2000年,最早的移民城市深圳700万人口中71%是农民工,东莞600万人口中67%是农民工。<sup>[21]</sup>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打工人口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小学和文盲占18%;全国外出打工人口中初中教育程度的占55%,小学和文盲占30%。对北京、无锡和珠海的近期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男女各一半,80%只有初中或者不到初中的教育程度,96%的人近5年没有接受过培训,但男性农民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女性。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sup>[22]</sup>通常是一个农村家庭无法担负全部孩子昂贵的学费,就先让女孩弃学外出打工,帮助家庭供养男孩读书。珠三角的加工业中,年轻女工是主要劳动力,集聚在电子、五金、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sup>[23]</sup>很多男孩子也因为考不上高中、考大学无望,或者对乏味的应试教育失去兴趣,就出来打工挣钱。打工生活辛苦,日日加班到深夜,年轻的打工者就自责:那时读书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才出来受这些苦。

#### (二) 工种和职业

其实,移民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其他大城市毕业,通过介绍或者招聘来到新开发区,获得管理干部、工程师、研究员、高级技师等薪水丰厚的上层工作,得到城市户口,获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优惠。他们不久买下宽敞的新房,

将全家迁来,并能获得很多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sup>①</sup>相比之下,没有足够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多是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餐饮酒店服务员、清洁工、家政服务等等熟练和技术工种;如果自雇会提供餐饮、便利店、蔬菜、日用杂货市场、出租车、补鞋电器修理,或者在企业里的非技术和勤务等等,成为城市生活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劳动力。<sup>[24]</sup>他们的工作没有列入企业和单位可上浮的工资单里,年复一年地干着没有保障的临时工和短期合同工。在城市里、工厂里工作5年、10年、15年,还是农民工。

### (三) 居住环境和社区

哪个城市繁荣,高楼就起得快。一群群建筑工衣衫不整,白天顶着烈日风雨,晚上住在简陋的民工棚,或者在没有完工的建筑里搭上床铺。里面堆满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小小的饭桌上,杯盆狼藉,电灯瓦数小,冬天没有取暖设备。<sup>[25]</sup>民工除了打牌睡觉之外,也不会请朋友来。深圳蛇口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区,为外来工盖了好几处宿舍楼区,保安、东莞等地也效仿之。一个宿舍区住满几千女工,每间房里四张高低床,一张公用的小书桌。长长的走道尽头是洗手间、冲凉洗衣房,走廊上晒满各色衣物,工人就坐在床边吃饭,附近没有康乐的设施。<sup>②[26]</sup>晚上,大部分民工都在加班、或者坐在床上思念亲人,在街头徘徊。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白天他们会集聚在街头巷尾,并且承受各种污名,一旦城里有刑事犯罪,进城的农村人就先受怀疑,肮脏、偷盗、不礼貌、不文明都自然而然变成他们的形容词。城市评选文明住宅区和农村推举“十佳”居民户当然也不会包括这些工棚,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保护、卫生防疫服务也不会进入这些工棚。

### (四) 人口分化和留守亲人的困境

当大批有劳力优势的青壮年流向城市、寻求发展和企盼挣钱,农村人口也在分化。<sup>[27]</sup>逃离了农村的贫苦,打工者住在城市的陋居中,对家乡的感情慢慢淡了。女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在城里找个男朋友组成一个家,不再回去。<sup>[28]</sup>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湖南、河南等农业人口输出大省,在农村大量出现“603861部队”。60多岁的父母和未出外的妇女,留守村中照顾没有跟父母出去的孩子。父母在城里的工作永远是临时的,吃住是凑合过的,城里幼儿园不收外来孩子,学校没户口上不了,孩子就只好留在家乡。

老人大都体弱多病文化低,又溺爱孩子。由于缺乏父母双方的亲情哺育,留守子女的安全、教育、情感、心理问题凸现出来。隋晓明对安徽、湖北、江西农村的调查发现:孩子染上坏习惯,放任自流,随意辍学,成绩偏下,心理生理发育

① 笔者在深圳研究的笔记和观察。

② 笔者在1985年和1990年调查笔记。

失衡,德智体发展滞后;因无人照顾和排忧解难,孩子被诱奸、犯罪、死亡的事件屡屡发生。据调查,留守孩子的性格趋于任性、冷漠、内向、孤独。农村的学校教师缺乏资源和培训,教学工作量大,没有时间顾及学生家庭里的问题,乡镇里也没有提供社会支援和心理辅导等服务。

### (五) 无序无保障生产

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按时领取工酬、工伤事故有医疗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人们都熟悉这样的故事:一个农民工外出到同乡亲戚手下打工,他听说每天苦力也有32元的收入,比起耕种一年几百元的收入,真是天壤之别。几个月后同乡的亲戚分文不付,几个民工只好离开,身无分文就徒步千里讨饭回家,沿路受尽欺辱。<sup>[29]</sup>其实包工头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包工头承包了5千多平方米、价值300多万元的合同,政府单位不按合同预付建筑款,包工头垫上自己的积蓄,加上贷款把城里人的家属楼盖好,由于甲方不付款,工资发不出还欠了一身债。民工催,债主遣人毒打,妻子受不得欺辱提出离婚。2004年一个女工在包装车间擦拭金属配件,接触了三氯乙烯金属清洁剂,工作一个月后死亡。超强度工作、无安全工作装置导致伤亡和职业病、矽肺病比比皆是。<sup>[30]</sup> 伤亡发生后雇主不付医疗和药物费,医院匆匆打发伤者,民工没有渠道追讨赔偿。珠三角的民工中七成没有合同、七成三没有社会保险、六成五遇工资拖欠、三成曾经被老板打骂,五成二在单位受歧视。<sup>[31]</sup> 民工希望挣钱,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和劳资关系的知识。在民工工作和生活的社区和网络中,缺乏培训和法律咨询服务,事情发生后,大部分民工只是找老乡求助,由亲人承担倒霉的命运。

### (六) 民工子女教育

正规的学校按照户口录取本地居住学生,理由是教育经费源自本地政府,外来人口子女就学会增加财政负担。<sup>[32]</sup> 早在1983年,深圳就出现外来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1990年深圳外来人口办起了40多所不被政府承认的“窝棚学校”,1993年外来注册人口达到200万,仅宝安就有20%的适龄儿童无处就学,全市非法民工子女学校达200多所。在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大部分都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sup>[33]</sup> 要进入政府学校,就必须缴纳高昂的借读费,因此只得进入临时性的地下窝棚学校。如果发生地下学校受到检查和勒令搬迁,民工子女就辍学在家。民工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即使交了借读费进了正规学校,尴尬的民工子女身份和经济拮据使成绩很好的孩子常“为一笔不足挂齿的费用愁眉不展”,给孩子留下心理上的阴影或者辍学;有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还要帮妈妈捡垃圾。<sup>[34]</sup> 窝棚学校的教师没有纳入正规的培训体系,低廉的学费不能为学校提供足够的经费,政府没有补助,教学质量不稳定。而正规学校里也还没有广泛地为民工子女提供融入当地文化的辅导,外地口音和不整的衣服足以使他们被排斥在许多快乐的活动之外。

### (七) 婚姻、情绪问题

农民工人口都在17~30岁之间,是恋爱婚嫁的最好时光。但无职业的临时工身份让他们没有归宿感,户籍和住房也没有希望,他们对恋爱和婚姻迷茫,家只是个幻梦。<sup>[35]</sup>例如,一个女工获得深圳十大杰出临时工的光荣称号,仍没有可能落户。对于女工,婚姻的限制大过男性。她们大部分连续做工五、六年帮助家里挣钱或者挣嫁妆。虽然女工的经济地位比在家乡好了,但“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外出女性希望找到比自己强的、至少有外出经历的同乡,父母也容易接受。不多的人成为“佼佼者”嫁入打工地;但有的恋上异乡人,有的打工多年大龄难嫁不再返乡,有的插入非婚性关系,酿就人生的烦恼和悔恨。而男性越发展,择偶和婚姻主动权越大,女性则越被动。在珠三角地区,打工人口性别失衡,女性为男性的两倍。女工常常暗自怀着找一个真正伴侣的想法。加工区到处都是招熟手女工的广告,因为女工有耐性、容易管理、工资普遍低于男性,而高技术工作中男性较多,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企业招工中的性别歧视使打工者人群性别失衡。在那些工业区和几千工人的宿舍区里,调查者几乎难以发现免费的公共娱乐设施,没有社会工作者、就业指导、心理辅导咨询等等设施和办公室。民工常常是以笔和手机相互安慰。深圳广播电台如“今夜不寂寞”等节目,成为夜晚民工可以聆听和倾谈的渠道。

### (八) 妇女的弱势

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同样一场改革,给妇女带来的麻烦多过好处。谭深认为妇女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其次才是妇女自身的问题。<sup>[36]</sup>整体而言她们文化程度低于男性,声音弱、寻业历程长。在中国的就业群体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中87%是男性,办事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中约65%是男性。完成中学和大学的男性高过女性好几个百分点,博士生中84%是男性,硕士生中70%是男性。在劳动市场中,女性整体就业年限比男性少5年以上,就业率比男性要少10%左右;59岁时仍有60%的男性就业而在55岁就只有40%的女性就业。<sup>[37]</sup>

侵犯女工权益的情况在镇以下的三资企业普遍存在。对珠三角的早期调查发现,50%的女工每天要加班至12小时、工作环境有损健康、缺乏保障、住宿条件恶劣、遇克扣工资、罚款和性骚扰等等。谭深列举了种种劳资纠纷、工人权益的恶性事件:1994年长春一私营企业女工集体中毒、深圳龙岗五层宿舍倒塌、珠海一染织厂火灾烧死上百人、女雇主用开水烫死工妹、拐卖妇女儿童、家庭暴力等等。女性自杀现象十分令人忧虑,2002年中国女性自杀率高出男性26%,家庭暴力、包二奶、离婚执法、婚姻道德等问题在2002年成为婚姻法修订的焦点。农村保健不足,孕妇死亡率是城市的2.3倍。2000年后农业女性化明显,从事纯农业的女性占82%;农村妇女的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在外务工的女性

收入是同类男性的82%，务农的女性收入是同类男性的60%。当妇女面临社会性的、工作之中以及家庭内部种种歧视和不利困境时，能够立即救助的社会性服务不足，她们也缺乏申诉渠道，或者更进一步沦为受害者。

### （九）下岗工人

国有企业在经济调整中不断采取的“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策略，产生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9年，失业人员达到560万，失业率为5.4%；第二次是1989年，持续三年，1200万人口城镇人口处于失业状态；1993年第三次失业高峰里当年失业人数为420万，1994年共有城镇失业人员476万。中国的失业率从1994年的2.8%持续上升到2005年的4.2%（城镇人口839万），而西部九个省的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sup>[38]</sup>年龄大、女性多、文化低成为下岗的主体特征，35岁以上的职工，老三届的知青，已婚女性，体力差、文化程度低、专业技术差的职工首当其冲。

但在有资源的情况下，一些下岗职工也可以重新创业上岗。例如一个28岁的白衣天使1999年下了岗，为了给生病的女儿治病，她参加培训，学习高空作业、洗地打蜡擦洗玻璃，获得上岗证书后就成立清洗服务公司，在高空清洗高楼的窗墙，做男人都不敢干的险累活，偿还了十万债务，公司还新添了设备。另一个45岁的男性职工1997年下岗后，在社区居委会的开导和鼓励下，放下大男人的架子，改变择业观，做起家政服务，无论是打扫清洁还是管道水电安装，都做到精心服务，2002年就再没有借钱吃过年饭，2003年办起家政服务中心，帮助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sup>[39]</sup>李瑾、秦学惠的调查提供了54位下岗职工创业成功的口述实录，他们大部分都在城镇工作，有居民委员会、培训班和朋友的帮助，走出了贫困。

总结上面的例证，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这些劳动群体在进入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培训就匆匆上岗工作，他们缺乏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去应付非农业性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第二，企业和政府都没有对弱势群体和农民工提供契约性保障，社会和企业缺乏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途径设计，他们一直处于廉价且可随时替代的劳动力境地，被困于下端阶层；第三，在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区域，缺乏针对他们切身利益的社会服务机构。即使政府有大量政策文件<sup>[40]</sup>，试图改善农民工的状况，鼓励为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培训，在快速的社会改革过程中，社会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机构提供必要的服务，并通过这些机构促进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 四、提供继续教育服务

教育被视为人力和文化资本。教育家和政策决策者面临着挑战：如何利用

教育为弱势群体提供第二次机会,使他们改善知识、技能和适应性,改善工作和生活状况,更具主动性地选择职业和生活,努力在代内上浮,尽量避免不利状况延续到下一代,减少个人贫苦以及对社会管理所造成的成本,这将提高社会和谐和管理效益。

弱势群体常常集聚在较为贫困的社区,公共设施比较差,个人可利用的资源几乎为零,除了最低限度的吃住之外,他们甚至缺乏交往联络的费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进入他们的社区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例如,英国利物浦工业区曾经集聚着贫困工人群众,成人教育者走出学校进入贫困人口居住区(Out-reach),向他们提供教育培训。<sup>[41]</sup>在美国,弱势群体一直是成人教育主要的服务对象,用以改善他们知识、士气和精神状况,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无论是由于他们的职前教育不足还是处于社会下端,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应该是终身的。<sup>[42]</sup>在20世纪后五十年里,成人教育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欧都成为普遍的社会体系。20世纪末,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正规教育以外的多种途径提供教育培训,使工人获得技能。<sup>[43]</sup>

其实中国有着非正规教育培训的传统。<sup>[44]</sup>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就有教育家对农民和工人提供各种教育培训。解放后,利用非正规教育扫盲也是有效的方法。在市场经济逐渐发育的情况下,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三元教育培训体系”:政府负责青少年时期的正规教育,为整体人口提供基础和高等教育以及专业教育;企业提供在职培训,提高职工和企业效益;社会其他教育服务机构提供收费的成人教育培训,改善个人流动的机会和生活质量。这一体系三足鼎立,但各自有明确的教育培训对象,各自有独立的资金来源,各自有教育培训的目标。在过去十五年里,还发展起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教育行动,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大学生“西部阳光行”、境外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西部和农村发展项目的支援。近年国内企业家也组织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对农牧社区发展做出有效的尝试。<sup>①</sup>这类自愿组织的行动有独立的目标,这些第三部门“不可能取代政府,也不可能取代商企业,只在政府和商业关注不到的点上,以灵活的方式”提供社会性教育和服务。<sup>②</sup>中国已经有了一一个多方参与的综合教育服务体系的雏形。

上述大量的例证和研究说明,弱势群体居住的社区缺乏社会基础设施。霍尔和约翰斯(Hall and Jones)<sup>[45]</sup>对127个国家人均经济产值进行比较后,提出社会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包括生产单位和政府政策、生产组织形态、社会机构和培训等等)是导致各国资本积累、教育程度、生产力提高以及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亚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贫穷”并非指社会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收入低和挨饿的问题,是一个是否具备达到最基本生活

① 参阅 <http://see.sina.com.cn/>

② 笔者对SEE生态协会的访问。

条件的能力和享有多少机会的社会公平问题。<sup>[46]</sup>因此,贫穷的实质是缺乏社会机会和改善生存机会。对成人的继续教育是指有意图的、有组织的教育过程,目的是提高成人的能力、丰富知识、提高技术和专业能力;或者在生活和社会转折时期协助他们改变方向和态度,达到个人充分的发展,以及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社会中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这是一个双重目标。<sup>[47]</sup>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要促进他们的自我改善,达到现代社会人应有的状态——获取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工作能力,有机会和能力参与社区活动、与社会交往、参与决策等等。<sup>[48]</sup>

在考虑以继续教育作为弱势群体的第二次机会时,需要建立贴近他们日常活动的社会基础设施,便于切身需要的教育培训和服务。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应该着重放在公共空间的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弱势群体获取机会。例如,政府公共转移支付一部分可以用于修缮村镇附近关闭的学校,提供图书馆、文化和教育培训设施,形成公众交流的空间,让农民、技术员、教师、干部和非政府组织等能有公共空间提供各类教育培训和其他服务。香港是大都市,其居民区的公共设施是值得借鉴的。例如,沙田有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各种培训设施供社会团体使用,政府还资助各种文化和培训活动,有私人资助修建的康乐设施,低收入居民可以免费或者低付费享受,减少了低收入家庭参与社会活动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其实,非正规教育培训、边干边学是人类长期以来传承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动态式教育培训方式。<sup>[49]</sup>对弱势群体提供的教育培训,要考虑他们工作生活特点和需要,容许各种非正规教育培训的形式,因为成人的教育培训需求与每天的实际活动有关。<sup>[50]</sup>例如,贵州独山进行了十年以上的“希望的绿洲”草场和畜牧业发展项目,是由外来专家指导、当地技术员和农民参加的发展项目,非正规教育配合项目进行,科学知识讲授、技术员培养和农民培训与实际生产需求始终交织在一起。最后,曾经是贫瘠的荒山变成青山草场,泉水涌出绵羊肥壮,农民盖起了新房子。再有,教育培训的目的是协助弱势群体,按照他们的需要改善学习和行动的能力。四川社科院组织的“成都市新移民家庭教育”项目,以志愿者介入的方法对新移民家庭作亲子互动,让家长和孩子互相倾听,学习尊重儿童和保护儿童的权利,使志愿者和农民工在共同认识的过程中助人、自助,将歧视性语言从社会的语境中清除出去。<sup>①</sup>非正规教育和成人培训成功根本在于配合有实际意义的社会需求和行动,教育培训要鼓励参与和自助行动。

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内容可以包括:(1)提供社会、科学和文化有关知识和技能,包括政府的法律法规、决策技能、协商和沟通反思技能等等,提高当事者参与的能力;(2)提倡生产经营实用知识技能,包括小生意和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财记账、电脑技术、分析信息、市场营销等技能,农村妇女生产和理家

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志愿者团队“成都市新移民家庭教育”项目,ggz7589@126.com。

占主导地位的,应该积极鼓励妇女参加培训,发挥她们在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长处;(3)鼓励教师和科技人员参与社区活动,例如云南师范大学在六哨乡进行参与式评估发展项目,就是农民、技术员、学校教师一起参与社区需求评估、培训和自我培训,技术员向农户和学生讲授种马铃薯的知识技能,教师直接参与编写课本,社区和农户直接受益;(4)利用多种文化教育传播手段,利用板报、教育传单、小册子和光盘的形式,传播有关的知识技能,编写贴近弱势群体需求的各种学习材料,很多非政府组织做了大量的这类工作,例如“成都市新移民家庭教育”项目为新移民家庭和孩子编写《家长学习手册》。

中国有与正规教育并行的成人教育体系,提供了从短期到高等学历教育的各种课程。<sup>[5]</sup>但存在的问题是,包括教育培训课程的内容与需求关联性不强,教学方法仍然以教师为主,缺乏对管理者和执教者的培训,缺乏对学习者的需求评估。另外由于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和隐蔽状态,缺乏固定的聚会环境,主流的社会和学校机构难以按照他们的需要设计和提供教育服务。因此,为他们设计教育培训课程首先要了解他们学习和服务的需求,先作教育工作者培训,再作教育培训服务。总之,为弱势群体和其他人口的继续教育应该考虑到一个人的多重需求——职业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社区发展的、补偿性的、健康和福利、家庭和个人价值实现等等。这并非任何一个教育机构都可以完成,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社区公共空间,会有利于促进各种社会团体的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培训和各种服务,这需要长期的努力。

中国已经有一个社会性的教育供给雏形——由国家、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教育和服务项目,通过协调和渐进发展,预期可以合理地解决教育的几个难题,如教育培训服务的目的、经费来源、教育培训的关联性和效果等。各种不同的教育服务机构面对他们特定的对象,根据需求提供适当的教育培训和服务,照顾每个人一生当中的发展需求,是可取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23.
- [2][11] Dronkers, J. (1997).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ducation*. Saha, L. 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Pergamon, 369—375.
- [3] 蔡昉. 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7—29.
- [4][22]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 改革, 2006, (5). [EB/OL]. www.usc.cuhk.edu.hk.
- [5][14] 萧今. 转型时期的中国教育改革转向何方[J]. 洪范研究. (吴敬琏,江平主编), 2006,3(2): 144—183.
- [7] 林卡,范晓光. 贫困和反贫困——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1).

- 世界银行. 国别报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 [8] 吴忠民.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J]. 东岳论丛, 2006,(2).
- [9] 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 中国地区差异报告[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康晓光. 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萧今. 现代化进程中严重滞后的村落:西部农村的社会环境[J]. 战略与管理, 2004, 26(3): 21—31.
- [10] Liu, Zeyun & Xiao, J. (2006).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ver time and their Impact on Salary Growth in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14 (2), 155—180.  
Fang, C., Zhang, X. & Fan, S. (2004).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Reforms*. Chen, A., Liu, G. G. & Zhang, K. H. (eds):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199—218
- [11] Thurow, L. (1996).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Schultz, T. (197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pencer,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 Aug.) 355—374.
- [12] Jarvis, P. (1984).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England: Groom Helm.  
Knowles, M. (1982). *Andragogy: The new science of education*. R. Gross (ed.) *Invita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 Chicago, Illinois: Follett Publishing, 145—152.  
Xiao, J. (2003). Redefining adult educat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Complements to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9(5), 487—508.
- [13] Belanger P. & Tuijnman, A. (1997). *New Patterns of Adult Learning: A Six-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Pergamon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Ziderman, A. & Horn, R. (1995). Many paths to skilled employment: A reverse tracer study of seven occupations in Colombia. *Education Economics*, 3 (1), 61—79.  
Xiao, J. & Tsang, M. C. (1999).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henzhe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57: 72—114;  
萧今. 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企业的策略与三元教育体系[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57.
- [15] Xiao, J. & Tsang, M. C. (2004). Determinants of participation and non-participation in job-rel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henzhen, China.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5(4), pp. 389—420.
- [16] Doray, P. & Arrowsmith, S. (1997).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 Belanger & A. Tuijnman (Eds.) *New patterns of adult learning: A six-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39—75. Oxford: Pergamon.  
Desjardins, R. (2003).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outcomes from a life-wide learning perspective in Canada. *Education Economics*, 11 (1), 11—38.
- [17] Benson, L. (1996). Postliteracy. Albert C. Tuijnm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nd). New York: Pergamon, 94—99.
- [18] Xiao, J. (2002). Determinants of salary growth in Shenzhen, China: An analysis of formal education, on-the-job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with a three-level model. *Econom-*

- 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1(6): 557—577.
- Xiao, J. (2001). Determinants of salary growth in Shanghai, China: An analysis of formal education, on-the-job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with a three-level model. *The 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1(1): 73—110.
- [19] Xiao, J. (2003). Redefining adult educat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Complements to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9(5): 487—508.
- Yogev, A. (1997). Second chance education and alternative route. Saha, L. 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Pergamon, 469—472.
- [20] Lauder, H. (2001). Innovation, skill diffus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P. Brown, A. Green, & H. Lauder (Eds.) *High skills: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kill 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1—203.
- Quigley, B. A., & Arrowsmith, S. (1997). The non-participation of undereducated adults. P. Belanger & A. Tuijnman (Eds.) *New patterns of adult learning: A six-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Pergamon, pp. 101—123.
- Rubenson, K., & Xu, G. (1997).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wards a new understanding. P. Belanger & A. Tuijnman (Eds.) *New patterns of adult learning: A six-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Pergamon, 77—100.
- [21][23][36] 王奋宇、赵延东. 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即决定因素[A]. 李培林.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的经济社会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34—148.
- [23][25][27][31][30][34][35][36] 刘开明. 边缘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4—5, 171—173, 19, 3, 194—202, 168—187; 2002: 189—207.
- [24][26][35] 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A]. 李培林.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的经济社会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49—160.
- Xiao, J. (1996).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the transfer of training in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Shenzhen, China.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7(1): 55—73.
- [25][28][30] 隋晓明. 中国民工调查[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7—8, 296—301, 306—311, 72—77.
- [27] 谭深. 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98, (6): 63—73.
- [29][30][33] 杜丽蓉. 城市民工生存报告[R].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4: 174—178, 152—160, 183—187, 178—183, 40—45.
- [31] 王颖. 中国农民打工调查[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5.
- [32] 梁在, 陈耀波. 农村—城市迁移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J]. 世界经济文汇, 2006(1): 1—17.
- [36] 谭深. 中国妇女发展的现状与趋势[A]. 汝信.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61—270.
- [37] 国家统计局. 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43, 46, 57, 59.
- [38] 刘拥. 第三次失业高峰[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1—13.

- 中国统计摘要 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46.
- [39] 李瑾、秦学惠. 平民创业让生活从头再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3—6, 13—15.
- [4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Z].北京:国务院,2006-01-31.  
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 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Z].北京:教育部(教职成[2002]15号),2002-12-02.
- [41] Osborn, M. (1996). Student Outreach. Albert C. *Tuijnm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nd). New York: Pergamon, 583—586.
- [42] Titmus, C. J. (1996). Adult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Albert C. *Tuijnm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nd). New York: Pergamon, 9—17.
- [43] Ziderman A. & Horn, R. (1995). Many paths to skilled employment: A reverse tracer study of seven occupations in Colombia. *Education Economics*, 3(1), 61—79.
- [44] 萧今. 有中国特色的三元教育培训体系[A]. 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企业的策略与三元教育体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5] Hall, R. E. & Jones, C. I.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83—116.
- [46] Amartya Sen Dec. (1985).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 Reply to Professor Peter Townsen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69—670.
- [47] UNESCO. (1976). General Conferenc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Education, 19th Session Report. UNESCO, Nairobi.
- [48] 萧今. 现代化进程中严重滞后的村落:西部农村的社会环境[J]. 战略与管理, 2004, 26(3): 21—31.
- [49] 萧今. 农村教育和培训应为社区建设服务[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5(2): 119—125.
- [50] Jarvis, P. (1984).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England: Groom Helm, 4—5.  
Knowles, M. (1982). *Andragogy: The new science of education*. R. Gross (ed.). *Invita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 Chicago, Illinois: Follett Publishing, 145—152.
- [51] 萧今. 中国高等成人教育:在发展中的定位[A]. 曾满超,魏新,萧今. 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沈文钦)

conomically weak.

In none of these arguments (except to supplement weak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y) is a case made for state *provision* of training. The case for public *subsidy* of training is strongest where externality effects of training are present and to support 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While there is usually much more public *provision* of training than is required by economic rationale alone, this may not be sub-optimal if public training is efficient and market-responsive.

### **Immigrants in Europe: What do We Know?**

Joop Hartog

Page 47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guide to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in Europe, by assessing the approaches and outcomes and reflecting on shortcomings. The paper ends with conclusions on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 not know.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GU Jiafeng

Page 54

**Abstract:** National provis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a major avenue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edg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developed different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to fit their own industry and labor-market conditions. From a country's standpoint, one country should integrate differ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to achieve ideal performance level.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could function to its best capacity is it is well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 **Stratifi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the Disadvantaged**

XIAO Jin

Page 63

**Abstract:** Economic reform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have led to re-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kforces by expanding employment in the emerg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Large rural workforces have moved into urban areas or suburbs. However, due to lack of adequate education, of such resources as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and of facilities and service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y are trapped at bottom of the society, which have made them disadvantaged. Education has a dual effect. Adequate education helps one move up or lack of it can trap one at the bottom.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vides the secondary opportunity to the disadvantaged.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fiscal transfer should aim at building up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mmunities of the disadvantaged. Those would provide a public sphere and allow a variety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eers to provide education and services for the needs of the disadvantaged.